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三〇期 ——
(二〇一二年一月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201a)

【文革一页】	我所了解的江青与康生的关系	杨银禄
【亲历者言】	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	孟祥才
【当事者说】	我经历的空 2 3 师在九一三事件前后	王仲齐
【文革回顾】	我参与查证“给林彪安窃听器”假案	张英华
【文革探索】	林彪的第三张“九八手令”	舒 云
【书刊通讯】	林彪文集面世颠覆官方史观	江 迅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文革一页】

我所了解的江青与康生的关系

• 杨银禄 •

◇ 康生早年就认识江青？

传说江青的母亲李栾氏曾给康生家当过佣人，就在那时，康生认识了江青。

江青的母亲是否给康生家当过佣人无从考证。即使当过，那也是江青五六岁的时候。1972年夏天，江青与美国女作家维特克夫人谈话时（当时我在场）说：“有一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我父亲因一件小事毒打了母亲，母亲忍无可忍，一气之下带着我离开了家门。”“我母亲要出去工作，因此我可以上学。”“诸城县一个有一妻几妾的姓孙的地主收留了我们俩。不久，母亲又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一家‘破落地主’。”“在我只有五六岁的时候，我就试着走夜路去找我母亲。”

假如有人认为这个“破落地主”就是康生家的话，康生是1898年出生，江青是191

4年出生，康生比江青大16岁，康当时是二十一二岁的风华正茂的小伙子，怎么会对一个五六岁的佣人家的小女孩产生好感呢？

1937年7月（有的说8月），江青从上海去延安。康生作为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王明的副手，与王明、陈云一起于1937年12月（有的说是11月29日）从苏联回到延安。在此之前，江青就与毛泽东相识了。作家王凡、东平在《徐明清与江青关系的事实真相》一文（《党史博览》2007年第3期）中说：“经过两个多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最终得以解决，她本人也于1937年11月进入抗大学习。在抗大学习期间，江青和毛泽东有了频繁接触。她经常以向毛泽东请教问题为由，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来做客。很快，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胫而走。”这可以说明，康生并未从中牵线。

江青与康生的政治和个人联系，是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后才开始的。在这之前，江与康是否认识，没有充分的证据，不得而知。

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后，历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发动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对江青的情况肯定了解，知道他们是山东同乡，更明白江青与毛主席的关系，所以对江青的进步是很关心的。1938年7月1日，中央党校召开建党17周年纪念大会，康生当主席，张闻天作报告，晚上演京剧《打渔杀家》。当时，康生是党校校长，江青是党校学生。康生动员江青演主角萧桂英，他自己还指挥乐队打小鼓。这出戏演出很成功，江青表演得很好。自此，江青在延安的名声就更大了。有人说：“那时江青很漂亮，不但会演电影，还会演京戏。”

◇ 两人互相关心，互相支持、配合

江青与康生的关系，以我的所见所闻，觉得从总的来说是比较好的。

党的九大期间，江青急欲进政治局，康生为她的这一愿望是尽了心、出了力的。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如愿当上政治局委员以后，康生高兴地跑到江青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热情地表示祝贺。几天后，康生又给江青写了“风华正茂”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康生的字写得很好，能左右开弓。他会刻章，会画画，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笔者注）康生还请人裱糊好，装进漂亮的镜框里，亲自跑到江青的住地，郑重地递到江青手里。江青看到这个条幅，如获至宝，一再向康生表示感谢。她说：“感谢康老对我的关心、肯定和鼓励。康老是我最好的老师。”康生听了以后，高兴地说：“江青同志是我最好的学生。”（在延安时，康生是党校校长，江青是党校学员，那时他们是师生关系——笔者注）康生走了以后，江青吩咐我们将康生写的这个条幅挂在大厅的正面南墙上。

江青的牙齿不好，有一次牙龈发炎，康生知道后，热情而耐心地建议江青使用竹盐水漱口。江青同意后，康生又把江青的厨师程汝明同志叫去，亲自教厨师如何做竹盐水。康生说：“用新鲜的竹子，把大粒的海盐灌到竹筒里，再把竹筒放进烤箱里烤。这样连竹子里面的内膜都炭化了，盐也烤得黑乎乎的了，倒上水，用这水漱口，漱几天以后，牙龈炎就好了。”江青遵嘱认真地做了。还真的管用，几天以后，牙病好了。

为了感谢康生的关心、帮助与鼓励，江青把康生请到她的摄影室，给康生照标准像，并放大16寸，亲自送给他。康生经常咳嗽，江青为了保护他的脖颈和喉咙不受凉，亲自送他一条她自己设计的獭皮围脖。

康生由于精神上受刺激过大，用脑过度，吸烟过量（平时一天能吸三包小熊猫香烟）等原

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精神和体质大不如前了。茶不思，饭不想，也很少睡觉。曾有几天，拒绝吃东西、喝水，总怕有人下毒。江青为了使康生吃东西，恢复体力，延长寿命，就叫程师傅做了几样好吃的小点心，亲自送到康生住地，端到他的病床前劝他吃。她当着康生的面先吃了一小块点心，并说：“好吃好吃。”康生见江青吃了，也跟着吃了。江青高兴地笑了。

江青回到自己的住地以后，对我们工作人员说：“康老这个人真奇怪，别人喝过的茶，放在他的眼前走开后，他赶紧抢过去就咕嘟咕嘟地喝了，他以为别人吃过的东西、喝过的茶，就可证明没有毒。”有人说他患的是严重的老年抑郁症。

为了使康生高兴，江青前后几次给康生送去鲜花，表示问候。有一天，江青亲自开着红旗车给康生送鲜花。由于是初学开车，驾驶技术太差，当开到钓鱼台8号楼东边的小桥时，差一点开进湖里去，坐在副驾驶室的司机小刘看到情况危险，啪的一下就把方向盘给扳正了。江青是经历过世面的人，如此危险的情景并没有惊吓着她，到了康生的床前，仍然很镇静地请康生赏花，请他保重身体，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在“批林批孔”初期，抱病在身的康生积极支持和配合江青的行动，江青则在1974年1月25日的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夸奖说，康老有功劳，康老立了一功……

◇ 江青对康生尊重有加

江青对康生十分尊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称呼上。江青称呼康生，无论当面还是背后，或者是文字称呼，我从未听到和看到她称“康生”，总是称“康老”。

二是在态度上。江青在我们工作人员面前从未讲过康生的坏话。有时不高兴了，实在忍不住了，想跟我们说说她内心的话，话刚露头，就立即收了回去。可是，她在背后经常讲陈伯达的坏话，说陈伯达“不修边幅、窝囊”，“他说他是小小的老百姓，哪有他这样的小小的老百姓，官大一级压死人”。还说“我跟他（陈伯达）吵过架，还在他面前摔过杯子”。有一次，她还在我面前发泄对张春桥、姚文元的不满。她说：“我跟陈伯达吵架时，张春桥、姚文元一声不吭，不坚持原则，我叫他们二位作检讨。”（他俩还真写了检讨，并亲自送到江青手里，才作罢——笔者注）可那天吵架时，康生也没有发言，江青却没有追究什么。

三是在看电影上。江青喜欢看电影是出了名的。在钓鱼台17号楼放映室里存放了上百部影片，这些影片如果没有江青的批准谁也取不走，但康生除外。

江青请康生陪看电影，他如有特殊情况就不去看，江青对康生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示。江青通知张春桥、姚文元看电影，他们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不陪她，她会不高兴甚至表示不满，有时还会拿他们是问。

◇ 康生的态度为何急转直下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康生对江青的态度，在我看来明显起了变化。他对江青的不满意既有说辞，又有表现。以前，康生经常到江青的住处去看江青，有事说事，无事问候。以后，一次也不去了。以前，江青请康生到17号楼陪她看电影，康生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会不去的。以后再请，一次也不去了。但江青并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以前，康生对江青很尊

敬，是江青政治上的坚强支持者和依靠者。从来没有听到过康生对江青有什么不好的说法，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就不同了。1970年中秋节，毛主席送给江青5个粘玉米，当时，江青送给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个，于是康生对此借题发挥。有一天，他对他的秘书黄宗汉说：“5个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那5个人，意思就是提醒江青在斗争中不要迷失方向，头脑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由此可以看出主席对江青的看法有了变化，我的这种分析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敏感，她会领悟到主席送给她5个玉米的含意的。”（1999年3月21日，黄宗汉告诉我的一一笔者注）

有一天，江青看望康生并回到她的住处以后，不知道为什么不高兴了，拉长脸说：“我以前多么关心他呀！我还送过他毛衣呢。我在延安的时候就织过毛衣，我给主席织过毛衣，还给康老织过毛衣，可是现在他……”当时我们不知道她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1974年3月20日，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说：“过去多年同你谈的话你好多都不执行”，“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同年7月17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10月18日，王洪文按照江青一伙的策划，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诬告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毛主席当即告诫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12月23日，周总理带病与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毛主席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再一次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重要职务。

康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老谋深算，又十分熟悉党内斗争，善于窥测政治动向，看到毛主席对江青一再进行严厉批评，就对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想急忙与她划清界线，拉开距离。他拒绝江青的探望，即使见了面也不给她好脸色。重病缠身的康生，于1974年周总理赴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之前，赶紧向周总理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接着他又托人给毛主席带话，揭发江、张的叛徒问题。

当然，江青也是一个很聪明、政治很敏感的人，康生对她的态度发生的巨大变化，她觉察到了，也十分不满，但这种不满大多数时候没有表现出来。

（作者杨银禄系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 《同舟共进》2011年第12期

~~~~~

# 【亲历者言】

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

• 孟祥才 •

谈及学部的“文化大革命”，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是三个绕不过去的人物。1966～1967年，我同他们有些接触，记之如下。

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这三个人的大名，我读大学时就知道了。因为当时我对思想史和哲学史比较感兴趣，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三人用“撒人兴”（即三人行）的笔名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关哲学史的文章，口气大而霸气足，其中批判冯友兰的文章“量多而质高”。后来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告诉我，冯友兰在给他们讲课时承认，尽管他不完全同意关锋的观点，但认为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关锋的水平是最高的。关锋、林聿时合著的《庄子内篇的今译和诠释》曾是我读《庄子》的入门书，我一口气读过两遍。

1966年3月至6月我被借调到《红旗》杂志工作时，关锋是该杂志的哲学史组组长。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去食堂吃中饭，一个《红旗》杂志的工作人员，指着一个瘦小且有点驼背的中年人对我说：“认识他吗？他就是关锋。”我立即站住，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走进另一个餐厅——在当时的中宣部机关食堂，司局级以上干部与其他干部的餐厅是分开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大人物。以后在中宣部大院还碰见过他两三次，但没有机会说话。在此期间，我读到 he 写的《论雷锋世界观的形成》和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被其高屋建瓴的气势和严密的逻辑力量所折服。

1966年7月17日下午，关锋和戚本禹等代表中央文革到学部，与时任学部工作组组长的张际春一起研究传达陈伯达指示和为历史所造反派翻案的问题，我被召去，近距离地看到了关锋：他身材瘦小，面带病容，留着小平头，头发短到与光头差不多。架一副深度近视镜，由于吸烟太多，牙齿都熏得有点发黑了。但讲话声音洪亮，斩钉截铁，透出不容置疑的气势。当晚，他在历史所小礼堂主持了全所工作人员和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学部工作组领导参加的会议，当场宣读了陈伯达的三点指示：一、郅家驹立即停职反省；二、立即释放一切被关被斗的群众；三、切断尹达与历史所的一切联系。接着讲了如何做好善后工作，要求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思想和行动上转过来，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

此后，我还在几次群众大会上，远远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关锋。从1966年5月至1967年7月，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徐向前）、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关锋，经历了他一生红得发紫的意气昂扬、飞扬跋扈的岁月。

1967年5、6月份，王力、关锋、戚本禹几个人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前台人物，四处插手，今天封这一派为“革命左派”，明天宣布那个人代表“革命大方向”，支一派、压一派，搅得不少地方和单位派仗连连、武斗不断。他们的丑恶行径在群众中引起越来越大的反感。有些群众组织就贴出大字报、大标语，要把他们作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揪出来批倒批臭。他们可能也感到了逼近自身的危险。1967年7月1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在当时的中央宣传部教育楼小礼堂召开北京市一些单位造反派代表人物参加的会议。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都出席了。我坐在会场的中间，基本能看清他们几个人的面部表情。我发现关锋有点精神委顿，面色蜡黄。他讲话时也没有了昔日的霸气，不是鼓励人们如何同“走资派”进行斗争，而是批评“怀疑一切”的倾向。他说：“有些造反派，今天抓一个，明天抓一个，老觉着不过瘾，老想抓大的，看谁都有问题。这种怀疑一切的倾向是不对的。”戚本禹发言时，就直接提到有人反关锋的问题，他指着关锋说：“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造反派，反对关锋。我今天给他讲讲情，你看关锋这么瘦，你们反他干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关锋。到8月份，他就同王力、穆欣、赵易亚、林杰一起垮台了。

1980年代初，我随山东出版界的领导和一些出版社的编辑到德州开会，当晚德州地委一位副书记出面请与会代表吃饭。席间他谈到，前不久中央组织部派人来德州，商量将关锋一家安排在德州的事宜，因为德州是他的老家。组织部文件规定：一、关锋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有公民权，享受正司局级待遇，以此标准为他安排一套住房；二、不要以党政机关的名

义宴请他；三、可以老朋友和同事的身份请他吃饭。德州方面同意后，关锋的妻子周英先来德州打探情况，因为德州还有关锋的前妻和儿女，周英认为两拨人马在一个地方容易闹矛盾，不方便。回京后，她找组织部，坚决要求留在北京。最后组织部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关锋一家也就留在了北京。关锋晚年在北京过着平静的生活，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又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对他来说，这应该是最好的结局了。

吴传启、林聿时是学部哲学所的司局级干部。由于他们在“文革”前与关锋就是熟稔的老朋友，所以“文革”开始时他们能从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关锋那里得到最核心的机密，比一般人更能窥透当前的政治动向。凭着这一优势，他们于1966年5月23日率先贴出批判杨述《青春漫语》的大字报，一下子占领了学部造反舞台的制高点。之后一路狂扫，不到一个月，即将当时的学部领导关山复、张友渔、刘导生、姜君辰和安排在经济所做研究员的张闻天以及一大批司局级的干部打入“走资派”的行列。当其时，他们的攻势之凌厉，进攻目标之精准，真具有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之势。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有关锋甚至陈伯达、康生的幕后指导。其中5月26日，就有康生对学部运动的四点指示。这个指示是写在学部党委给上面的一份报告上：“一、贴大字报难道还要批准么？二、林聿时为什么不能贴大字报？三、学部的问题很多。四、哲学所的问题更多。”

6月中旬，吴传启、林聿时推出潘梓年作牌位，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权。这时，在各单位呼吁下，中央开始向直属单位派出工作组，以代替各单位的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6月26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陶铸，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即与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相结合，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

7月中旬，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回到北京。7月26日，他下令撤销工作组，并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此后，学部开始批判工作组执行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事实是，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在学部领导运动的一个月里，所有的决策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都是参与的。可是不久他们就借批判“资反”路线之机大批工作组，说他们与工作组之间一直存在“路线斗争”。在批判张际春的时候，吴传启、林聿时慷慨激昂地举出一系列的例子，说明他们在与工作组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张际春则坚决予以否认，认为他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路线斗争。他说：“所有的大事都是我们一起决定的，那时你们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怎么现在就有了路线斗争？”吴传启和林聿时在发言中说，在历史所的造反派受到尹达的镇压时，以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支持尹达一伙，他们则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张际春则说工作组与吴、林等一样都是支持尹达的。我当时参加大会，误认为吴、林说的是事实，还对他们心存感激。但后来，工作组的会议记录等材料曝光，证明吴、林说的全是精心编造的假话，他们与工作组在绝大多数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傅崇兰将此事告诉我以后，我对吴、林等人开始怀疑，觉得他们的品质有问题。

不久，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使我大吃一惊：一天晚上，吴、林等人一起在近代史所开会，策划第二天的一个会议，准备对一个人进行批判斗争。我与另外二十多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二天开会时，参会的一个人突然站出来揭发林聿时，说昨天晚上林策划了一个大黑会，并将林讲的一段话原原本本复述出来，要求林作出答复。我这才明白这个人是对立面派出的一个“卧底”，他讲的完全是事实。我正为林聿时如何回答琢磨时，林不动声色地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你是造谣。”这个人马上将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谁坐在什么位置的情况都讲了，问林还有什么话说。林依然不动声色说：“你就是造谣！你根本就没有参加那次会！你说你参加了，谁能证明你参加了？”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除了这个“卧底”外，其他都是与林一派的人，自然谁也不会出来证明他的话是事实。后来，传出林聿时对他的心腹之人传授的“政治斗争三原则：一、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二、谣言重复三遍就是真理。三、善于引导对手犯错误。”我逐渐觉得吴传启、林聿时的品质太坏太可怕，萌生了与他们决裂的念头。所以第二年4月傅崇兰与我

们几个人商量与他们决裂时，我是没有任何犹豫的。

学部的运动进行到8月份，随着社会上红卫兵组织的蓬勃发展，吴、林等感到需要在学部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作为他们的工具，于是就由他们指定的年轻的造反派、哲学所的邹永图出来联络学部其他所同一派的组织，酝酿成立一个学部的红卫兵组织，得到了各所的赞同，于是在8月27日成立了学部的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学部红卫兵联队”。历史所文革小组指定我代表历史所参加这个组织。我记得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是：队长曹震中（近代史所）、副队长杜书瀛（文学所）、指导员邹永图，我被安排当了副指导员，同时兼任历史所红卫兵支队的队长。其实我参加这个组织的具体活动不多，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在所里协助傅崇兰组织一系列的活动。在学部，我们的对立面见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也很很快拉起了一个叫“学部红卫兵总队”的组织，领导者叫总队长和教导员，这显然是要在名目上压我们一头。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吴传启，以后学部主要就是这两派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1966年8月底，在吴传启、林聿时主持的一次红卫兵联队主要负责人的会议上，吴传启拿出笔记本，说：“毛主席最近写了一张大字报，是批判刘少奇的。”接着，他就抑扬顿挫地将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读了一遍。这张大字报在当时属于绝密，可吴传启很快就拿到了，这显然是关锋传给他的。靠着关锋的支持，吴传启、林聿时利用红卫兵联队，同反对他的红卫兵总队进行着日益激烈的斗争。

总队的一个专门小组，查阅了吴传启的历史和大量文章，以各种形式揭发和宣扬他的“罪行”，将他定为“三反分子”穷追猛打。其中最要害的是吴在一次会上攻击大跃进的话：“裤子赔光了，还谈什么政治！”哲学所的保吴铁杆分子则针对总队提出的指控一一进行反驳。后来双方达成协议，于1966年的9月12日至17日，进行了七天的大会辩论，一对一发言，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声嘶力竭，唇枪舌剑。结果自然是谁也不服输。总队于是将吴的“罪行”材料抄成大字报，印成小字报，贴满北京城。重复最多的是吴的点睛之论“裤子赔光了，还谈什么政治！”一时间将吴搞得灰头土脸。

在辩论会进行的同时，吴传启、林聿时正通过关锋运作，要求陶铸出面保吴传启。9月20日，陶铸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发出了四点指示，中心内容是肯定吴是“革命左派”，“中央宣传部对他是信任和支持的”，但也指明，群众对吴的问题可以辩论。拿到陶铸的四点指示，吴、林如获至宝，立即印成传单广为散发。至此，明眼人都意识到，吴、林上面有“硬根子”，是不易扳倒的。此后，总队每况愈下，其中的不少群众纷纷“反戈一击”，站到了联队方面。

进入1966年12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抛出陶铸。最先得到内部信息的人民出版社李冠英等人于12月19日贴出批判陶铸的大字报，指控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样得到内部信息的吴、林立即紧紧跟上，指使联队到中宣部大院贴出“打倒陶铸”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蒙在鼓里的总队认为陶铸是当时中央的第四号人物，怎么也不应该打倒。于是也组织人到中宣部大院贴出“谁反对陶铸，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总队棋失一着，更加被动。

吴、林对陶铸的垮台欣喜若狂，一面指使哲学所周景芳等50余人联名于12月23日贴出《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到底站在哪一边？》的大字报，同时动员其他所也贴出攻击陶铸的大字报，大造声势；一面要联队出面，与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兵团等造反组织联合成立“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将批陶的旗帜牢牢抓在自己手上。

然而，这时的吴、林也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解释陶铸“九二〇”保吴的四点指示？因为

在多数群众看来，这个指示是“吴、林与陶铸勾结的铁证”。其实，这种事的辩证在以耍笔杆子为职业，极尽翻云覆雨之能事的吴、林那里，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立即指使几个人贴出批判“四点指示”的大字报，硬说“四点指示”是“陶铸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明里保吴传启，实际上“支持总队继续整吴传启的黑材料”。

1967年初，吴传启、林聿时操纵联队，以打、砸、抢、抓、抄的血腥手段，将总队打垮，暂时实现了他们在学部的“一统天下”。紧接着，所谓大批判开始，吴、林利用他们与王、关、戚、穆欣、林杰等人的关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大量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出尽了风头。

不过，联队中对吴、林飞扬跋扈、颐指气使、专断独行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逐渐结合在一起，酝酿对他们展开新的斗争。1967年4月初，傅崇兰联合近代史研究所张德信、张海鹏，外国文学所吴元迈，经济所吴敬琏、黄范章，宗教所金易九、黄心川以及其他所对吴传启、林聿时不满的部分人，决心拉出队伍同吴、林对着干。为此，张显清和我都认为，在我们正式向林、吴发难前，我们应该向戚本禹写一份翔实的报告，说明他们的问题和我们不得已向他们发难的苦衷。由于我们所文革小组内部几个人和部分群众不同意与吴、林分裂，一旦我们发难，历史所的文革小组和我们一派的群众也就分裂了。这一点我们都充分估计到了。傅、张和我三人在分析了各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后，决心不惜分裂，带领一部分群众向吴、林发难。为此，我起草了一份翔实的报告，将吴、林的劣迹作了详尽的记述，希望戚本禹能支持我们的行动。报告送上去以后，我们立即给当时戚的秘书李斌城打电话，要他尽快将我们的报告让戚看到并表态。李说他已经将我们的报告放在送阅文件报告的第一份，戚第一眼就能看到。第二天，我们再打电话给李问情况，李说戚已经看到了，但脸色很难看，没有在你的报告上批一个字。对戚的态度，我们三人进行分析，认为戚与关锋关系很好，而吴、林又是关执意支持的。关也知道戚一直支持我们。我们向吴、林发难，关可能怀疑是戚背后支持的，我们的行动使戚很作难。在这种情况下，戚不明确表态反对，我们就可以干了。就这样，我们与吴、林一派分裂，另立了一个山头。被打垮的总队看到我们起而反对吴、林，也趁机再起，恢复活动。由于总队是一直反吴、林的，我们也拉队伍反吴、林，我们之间的斗争自然也就停止了。但我们两派并没有实现联合，原因一是总队此时对我们存有戒心，二是我们也觉得总队是“老保”，我们这些响当当的造反派羞于与他们为伍。至此，学部就分成了三大派。

既然造了吴、林的反，我们就要选一个突破口作为攻击的重点，思谋再三，就选了潘梓年。为什么选他作为突破口呢？一是因为他是学部的一号人物，在学部的副主任中级别最高，行政六级，一级研究员，排名仅在郭老之下，打倒他，影响大。二是因为他是吴、林的牌位，打倒他，吴、林就摆脱不了干系。三是有叛徒的问题。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据社会上传来的一些材料，他是叛徒的可能性很大。当时全国正形成一个抓叛徒的热潮，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派是北京造反派中的“天”派，与以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为代表的“地”派对立，吴、林支持地派，天派自然想打倒他们。北京大学的造反派一直宣称他们有打倒潘梓年的过硬材料。为同学部的吴、林作斗争，他们还组织了一个潘梓年专案组。我们于是通过各种关系与他们沟通，终于把他们掌握的材料弄到手。之后，傅崇兰安排我向我们一派的骨干分子们做了一次潘梓年问题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就凭这些材料也可以打倒潘梓年。于是我们这一派就在学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揭露批判潘梓年的大会，由我在会上详细介绍了潘的所谓叛变材料，使我们这一派人认为潘的叛徒问题是板上钉钉的铁案。我们这次大会后，吴、林并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击，只是在他们的骨干分子小范围内，由白钢介绍了潘的有关情况，结论是他不是叛徒。后来的事实说明，我们的材料是似是而非的，潘并不是叛徒。不过，由于吴、林在社会上到处插手，引起中央高层的注意，关锋就指示他们采取“龟缩”的策略，所以他们并没有大张旗鼓地为潘辩护，也没有对我们的“反叛”进行猛烈反击。



我们同吴、林分裂后，双方尽管互相敌视，但也没有打得死去活来。他们知道我们的后台是戚本禹，所以不敢对我们为之过甚；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后台是关锋，明白只要关锋不倒，他们也垮不了。我们虽然一时看不出将来的结果如何，但仍然坚持同吴、林的斗争。因为我们认准两点：一是潘的叛徒问题基本可以确定，二是吴、林是搞阴谋诡计的坏人。即使打不倒他们，我们也决不同他们为伍。

我们一派在集中力量揭露和批判潘梓年的同时，对吴传启和林聿时也写大字报进行揭露和批判。一天，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的黄宣民找到我，有点神秘地对我说，你看看这两本书。说着拿出苏联学者罗森·塔尔解释《资本论》的一部书和吴传启所著同样内容的一部书。他翻开两书，各找了两段，让我对比看一看。这两段文字基本相同。我问黄：“你认为吴传启的书抄了罗森·塔尔？”黄说：“我一年前就发现吴传启的书基本上是从罗森·塔尔那里抄来的，以前你们同吴传启站在一起，我不敢告诉你。现在你们反他了，我想这是打击他的很有力的炮弹。你看怎么办？”我说，立即写大字报揭发他，这对搞臭吴传启能起很大作用。黄建议我找几个人先写几张大字报贴出去，他准备整理一份将两书详细对比的资料油印，广泛散发。我同意黄的意见，就找了王宇信几个人写大字报，揭露了吴传启剽窃的丑行。记得王宇信的大字报幽默地讥讽说：“我们建议吴传启干脆改名叫吴传·塔尔吧！”后来不少批判吴传启的大字报就称他为吴传·塔尔了。十多天后，黄宣民刻写的六七万字的罗森·塔尔、吴传启两书对比的材料油印出来，广为散发，这对解构吴传启的学者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7年8月7日，王力对外交部的造反派讲话，煽动他们火烧北京的英国代办处，造成了重大的外交事件。毛主席下令将王力、关锋逮捕监禁。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立即出来大骂王力、关锋是隐藏在中央文革内部的“小爬虫”和“变色龙”，宣扬他们一贯同王、关作斗争。据说上边一开始准备将戚本禹与王、关同时端出来，是毛主席决定暂时将戚与王、关分割开来，以观后效。由于王、关被端出来，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以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由于我们一派是从“联队”一派中分化出来，而且支持我们的戚本禹又仍然在露面，所以原“联队”的群众都纷纷倒向我们，我们一派一时占了上风，达到我们这一派最辉煌的时期。一时间我们忙于收拾残局，一方面将原联队的头头看管起来，另一方面根据戚本禹传达的周总理指示协助二炮保卫部追捕在逃的吴传启、潘梓年等人。不久，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被北京卫戍区收监，联队在各所的头头全都隔离审查。为了清算他们的罪行，我们专门成立了专案组。在我们一派表面上看来取得大胜的日子里，我的任务一是协助傅崇兰主持历史所的日常工作，二是组织批判林聿时、吴传启等的罪行。为此我写了大量的大字报。我一边起草，一边有三四个人为我抄成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全部贴到学部大院供人们阅览，同时供我们一派广播之用。我写的批判林聿时“政治斗争三原则”的大字报，我们的广播站一连播了三天。可以说在历史所参加“文革”的所有人中，我可能是写大字报数量最多的人之一。“文革”后，有一次开会时见到陈智超（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孙子），他还同我开玩笑说：“你调走后，我在一个办公室的抽屉里还发现打印过的你写的大字报，真多呀，满够出一个集子的了。”

1980年代，吴传启、林聿时被从监狱放出来，“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使他们在北京平静地度过了最后的岁月。我想，当他们陷身囹圄的时候，可能压根儿就不会想到自己的晚景还有一抹如此美好的夕阳。

□ 《历史学家茶座》 2011年第2期

~~~~~

【当事者说】

我经历的空23师在九一三事件前后

• 王仲齐 •

100年前农历辛亥年的由武昌起义引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泛深入人心。40年前农历辛亥年的由林彪出逃引发的“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使更多人从崇拜的狂热中觉醒。

上周看到了一位战友在网上写的“九一三事件的23师”，引起了我的灵感。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以及“大小舰队”之类的事情虽然没有直接发生在西北地区，但因为我们是空军部队，多多少少也属于“灾区”范围之内，肯定受到一些影响，现将我直接经历和看到、听到的情况向战友们做一叙述，希望能帮助老同志回忆往事，帮助年青同志了解点知识。

我是1968年2月从北京东城区入伍，1971年3月提干，任临潼场站调度室调度员，当时调度室编制在场站，工作和管理隶属于师司令部作战科，对上面一些事接触、了解多一点。

1970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总结报告上的批语”传达之后，全军以至全国都掀起了野营拉练的热潮。因为空军部队的老飞行人员、营以上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从陆军转过来的，热情格外高涨。通过拉练锻炼了部队，密切了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分批拉练之后部队进入了飞行训练高潮。临潼机场两个团67团、69团，除了平时外，有时连周日也搭上，不光有正常的夜航，还经常飞拂晓。因为前些年（1966至1970年）一个是突出政治、搞学习；一个是为战备搞疏散和挖地道（23师受到表扬）耽误了不少训练时间。

4月份，按中央文件要求，分批向各级干部传达了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并进行了批陈（陈伯达）整风学习。在那个年代，1961年以后入伍的干部别管当什么官都是行政23级，唯一能在众人面前显示干部身份的就是听文件传达。当时学习传达文件经常分级，能先听到的人，好像抬高了自己的身份，有一种政治和心理上的荣誉感，其实很多文件根本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作战部队有职务明确的中队长、大队长、团长或营、连长、排长之分，机关除了科长算明确的副团级干部外很多都不十分明确，就连副科长一会儿算团，一会儿算营。参谋、干事、助理员算连级，技师等按领导和干部部门的意志订，但有一条是法定的，订高订低都不长和不降工资。

师里按文件精神分三批，科团和18级（享受县团级，基本上是没有职务的老飞行人员）以上干部一批；连以上干部一批，上述人员传达的中央文件点了陈伯达和李雪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郑维山（北京军区代司令员）的名；剩下的排级和一些技术干部学习报纸上的文章，进行正面教育。我们这些刚提拔的干部无所谓，而一些老一点的同志，技术职称和不明确级别的干部心里特别不好受，70年代初期，不少干部提干两三年就升任连级了（包括参谋、干事）。我们司令部侦查科判读员李耀尔同志1950年入伍，行政19级，是全空军的业务尖子，因为判读员属于职务不太明确的干部，所以只能和我们这些刚提拔的干部一起学报纸，老李是云南人，说话很买慢，带点口音，他学习发言时感叹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当了20多年兵了，还享受不到连级待遇，可悲呀！”

虽然当时公开的报纸上没有点陈伯达的名，只提“×××一类的“政治骗子”，可稍微爱关心“政治”的人都知道这是指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但在一般人心目中总感觉陈伯达是个文化人，文化大革命前期比他大的都批了，这也不算个什么。至于庐山会议上黄、吴、叶、李、邱的问题，因为中央文件只传达到省军级，下面也不知道。

4月份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中美掀起了“乒乓外交”，7月14日发表了尼克松将要来华访问的公告，人们的思想更相对趋于平静，部队训练、演习和其他工作都正常进行。

8月底，69团去贵阳组建50师，68团因驻训的三原机场没有夜航条件，二大队来临潼逐步恢复夜航训练。

9月12日晚，轮到我值夜班，虽然是周日，但67团的夜航训练将近0点才结束，68团二大队准备第二天天亮后开飞。我做完当天飞行的各种登记的工作后就进入了梦乡。也不知道夜里几点钟，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给叫醒，总之还是深夜，我迷迷糊糊地抓起电话，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在调度训练班的同学，兰州军区空军调度室的值班员甘世清，只听他说：“告诉你，现在所有飞机都不能起飞。”我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马上回了他一句：“放狗屁，三更半夜，哪有飞行，你是不是脑袋有毛病了。”他没有发火，一本正经地说：“我告诉你了王仲齐。”说完就放下电话。接完电话之后，我本来想继续睡觉，后来一琢磨，不行，明天68团还有飞行，跟他们说一下，于是抓起电话给68团值班参谋去了电话，当时68团二大队是临时替代的参谋，一个老通讯员值班，他听完我的电话后回答说，“净空了，明白。”我这时候才有了一个净空的概念。（第二天在值班日志里还是把军队术语“净空”两字写成“禁空”）本想继续睡觉，转念一想，向指挥所也说一下吧，于是给师指挥所打了个电话，值班的参谋（姑且隐去姓名）听完我的电话后，“嗯”了一声就给挂了。

13日6点，气象台观测报告记录：临潼机场云量10个，云高3000米，东南风3到4米，能见度大于10公里，这绝对是个飞行的好天气。我刚起床，就接到师长的电话，他说，“天气这么好，今天为什么不让飞行？”我赶忙报告说，上级调度部门夜里来电话不让起飞飞机，他一听非常生气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告，我赶忙解释，我夜里就向指挥所报告过了。后来才知道指挥所的值班参谋根本就没把这件事当回事，更没有什么观念，接完我的电话又继续蒙头大睡了，起床后还跟没事人似的。那天除了飞行团空地勤和场站后勤保障人员外，当天早上需要下部队跟班的司、政机关人员都不知道，有的还去了外场和飞行团。事后要不是该参谋人缘好，平时工作兢兢业业，肯定要受处分。

当天上午，师指挥所收到上级指示，说是为了防止敌人机降，在跑道两头内300米处和中间各停放汽车一辆，在草地迫降场平行位置上摆放三排旧油桶。跑道上设置障碍物在1969年11月紧急战备时摆过一段时间，进入70年代后就撤了，现在又让摆，大伙琢磨是不是北方边境形势又紧张了。下午作战科长张学谦科长陪同驻地陆军47军的作战处长来到调度室，详细观看了挂在墙上的机场平面图，张科长说，陆军要进驻和我们共同保卫机场，叫我们做好配合。后来他们也没有再来。事后了解，47军在整个九一三事件中没有什么行动。我估计是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同空军关系密切，当天很多情况也都不十分清楚了，上级为防止意外，准备要采取一些措施，事后看来问题也没那么严重，所以未实施。当然像北京34师所属的西郊、沙河、南苑机场，南空15师的硕放机场，广空9师的沙堤机场等可能跟我们的待遇就不一样了。

“净空”开始几天，离我们机场24公里的西安民航机场也没有起降的飞机，十天后从无线电里知道它们有飞机开始起降了。部队除了在机场跑道上摆放障碍物之外，没有别的行动，各单位每天不是政治学习就是搞生产劳动，中间传达了一次上级指示说是为了节约闹革命，今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就不举行群众游行了。不游就不游了，我们也不在北京，大伙对此也没多想。

9月20日，根据中央的最新精神，排级干部集中学习上半年连以上干部学习过的批判陈

伯达的文件。全师4月份没有听到文件传达的排级干部全部集中在空着的老69团机务大队楼里听文件传达、批判，还让揭发，当然更强调保密。我入伍前住在中央机关大院，陈伯达是机关的主要领导，虽然他以毛主席“大秘书”的身份在中南海工作和居住，但在院里也经常能看见他。他的两个秘书和我们家住一个楼，见面管他们都叫“叔叔”，至今他们和江青、陆定一等秘书还因为写回忆文章，写书，整天找我查资料、在我办公室转悠，他的小儿子至今和我还在一个院住。文革初期，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机关院里接见外地造反派时，我多次当面听过他讲话，作为红卫兵还给他站过岗，维持过治安。陈伯达是机关领导中唯一爱跳舞的，1964年前，周六晚上经常来机关跳舞，为此，很多女的都给他张罗。他跳舞的礼堂也是院内的学生俱乐部，平时周六下午学校只一节课，机关为了怕孩子们到处乱“疯”，就开放俱乐部，供大家读书、娱乐。如果晚上他跳舞，俱乐部下午就不开放了，为此孩子们因“这件事”对他很烦。此外他家庭关系和个人桃色事件的传闻大伙也都有耳闻。学习时，有一个北京老乡说，陈伯达在你们院，你可以揭发点，主持讨论会的直工科袁科长听到这个信息，赶紧对我说，最好有新的揭发材料。本来我想瞎侃两句呢，后来一琢磨，做人不要墙倒众人推，少说为佳，再说现在也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了，政治上的事，咱只看见表面，具体很多事你也不知道，最好别跟着瞎掺和，这帮“政治骗子”（那时我们背后都爱管政治部的干部叫“政治骗子”，熟悉的当面也这么叫。因为当时确有个别政工干部，嘴巴上夸夸其谈，而个人做得却另是一套，还有的飞行干部在技术上装糊涂，停飞改做政工后靠嘴巴青云之上）见识少，今天需要你，让你说，明天说不定为自己的另外的需要又怎么瞎联系呢。于是我说，他们大人的事，我也不太清楚。并按照文件精神和大伙的同样口径，按程序做了批判发言。

10月5日，《参考消息》头版下方的一条消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文章内容是，“当时苏联某领导人出访回国，其他领导人去机场迎接后立即返回，可能是为中国发生的异常事件。”看到这条消息后大伙猜想《参考消息》登消息历来也是有选择的，什么异常事件，是不是又揪出坏人了，净空快一个月了，还不让飞行肯定是军队内部出了问题，我往黄永胜和吴法宪那都想过，但没敢往副统帅林彪那想，因为那是副统帅，党章规定的法定接班人，公安“六条”保护的，那个年代，这在人们脑袋里是根深蒂固的，想都不敢想。实际上中央在9月18日就发了关于林彪出逃的57号文件，黄永胜、吴法宪等已停职反省，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军委办公会议已主持军队日常工作，但文件只传达到省、军级，我们是师级单位当然不会知道，有的领导还问我们北京兵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10月12日（周二）上午，突然接到通知，部队连以上干部、飞行人员、维护飞机的地勤人员（包括战士）都到大礼堂开会，而且单位不许留值班人员，实在需要有人值班的部门，由其它后勤单位的排级干部帮助照料。（因为临潼机场是西安西关民航机场的固定备降场，必须24小时值班，领导安排气象台的排级测报组长帮助听电话，他看见我们新提拔的干部也去，表情上显得很很不愉快，实际上调度员不管什么级别，在这件事上肯定要介入）。

当天下午，当我们排队进入听报告的大礼堂时发现礼堂门口站岗值勤的和以往不一样，不是警卫连战士，而是部队的团级干部（事后知道团以上干部前一天已听过传达），而且过去凡是大规模活动时各单位总是先互相拉歌，这次全没有。会议也没有主持人，只有平时很少见面的姚长川军长一个人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坐在主席台中间。开会时间到了之后。他拿起文件就宣读“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刚听完前几句时，几乎所有当时听传达的人事后都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脑袋大了，以为听错了，估计当时全中国对政治感兴趣的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可能基本都是如此。文件传达后，军长要求各单位进行几天讨论，并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传达的义务，谁要是泄漏出去不管职务高低一律给予处分。虽然上级要求的很严，但还是发现有个别地勤新战士把这一消息告诉自己在其他单位同期入伍的老乡。有的老乡听到后作为新闻告诉了自己的班长，班长以为是造谣立刻汇报了上去，也有的老乡为了

显示觉悟高，自己向领导做了汇报，结果这几名地勤战士都受到了行政警告处分。实际上20天之后这些文件都向全军和全国所有人员都传达了。不知这几名战士复员时处分给取消了没有，要不然真是太冤枉了，在那个年代，档案里有个处分复员回家，找工作肯定受影响。我的老乡，警卫连驻守军械库的班长任红福，听到班里战士反映后马上汇报到连里，连里逐级上报，他受到师里通报表扬。为此，他入党时间也提前了，几个月后入党填表时，虽然林彪事件已经公开，但他还是享受原来可能没有的评价，“觉悟高、政治敏锐性强”等好的词语。我们见面时还拿这事同他开玩笑。

第二天，所有听过传达的人员都集中进行讨论，大楼外有人站岗，无关人员不许进入。我们组在老69团团直二楼最东南的房间。全组十几个人，没有“四野”出身的干部。组长是作战科孙树永参谋（10天后在新69团组建时升任作战科副科长，后为23师参谋长，转业前为兰空司令部参谋长助理），孙启宗副师长也在我们组。讨论时大家一致对林彪一伙阴谋政变叛国出逃表示极大的愤慨，尤其对文件所讲的他们妄图谋害毛主席的行径更是义愤填膺，赵荣庆（师目标引导组组长，1945年入伍的临汾旅老战士）同志哭出了眼泪。当时我们感到老同志就是觉悟高，对毛主席的感情就是深。也有个别人情绪挺激动，语言挺丰富，怎么挤也没见流出泪来。

空军部队是建国后在陆军的基础上组建的，人员来自各个野战军，文革开始后由于林彪成了副统帅，报纸上凡有重大事件表态的文章或事情，属于原四野部队刊登的相对多。我记得23师原来有个出身“塔山英雄团”的政治部曲副主任，动不动报纸、杂志上就登他的文章（文章肯定是写作班子写的，有的他本人未必知道）。加之个别从四野来的同志说话也不注意，大会、小会张嘴“林总”，闭嘴我们“四野”如何如何，使得其他野战军来的同志平时嘴上没有他们硬，所以在讨论会上有来自其他野战军的同志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四野”。一个原“二野”的老同志气愤的说，本来进攻时先在敌人阵地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得手后迅速扩大战果，正面进攻和侧面迂回包围、分割、穿插相配合的“一点两面”战术。战斗中为了队行疏散，减少伤亡每个班分成三个小组战斗，每组三至四名战士，进攻时以小组为单位采取此起彼伏跳跃前进互相掩护的“三三制”战术，以及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四快一慢”等战术，我们入伍时在部队就广泛应用，怎么现在都成了林彪和他们“四野”发明的了，其他老同志也发泄了对报纸过份宣传四野的不满。在我们组的孙副师长虽然来自三野，听到这些发言后立即明确表态，说，批判林彪的矛头不许指向“四野”，几个野战军都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不能把林彪的问题同“四野”联系起来。这才使讨论又回到了正题。我当时感到，孙副师长水平就是高，否则人家怎么当师领导了（孙启宗副师长两个月后调到“重灾区”34师任副师长）。

1971年10月底，文件传达到所有人员，部队全体又进行了半个月的学习讨论。这时，最让大家高兴的是上级宣布，取消了每年年底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评比。

从1960年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部队每年年底都要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到“文革”时期这一活动达到了顶峰。也成了各级干部和战士们最头疼的事。

“四好连队”的评比按不成文的规定，每个部队起码要有一到两个从1961年开始，一直年年都评上的标兵单位，即使这个单位当年出了事故，年底也要编一个坏事变好事的经验材料来介绍。结果使这个单位的干部战士趾高气扬，极大影响了其他单位干部战士的情绪。我在警卫连当兵时，我们连很多人都讨厌汽车连指导员，因为汽车连是连续多年的“四好连队”，经常出席空军、军区空军先进大会，他回来后向其它连队传达会议精神时神气十足、耀武扬威，好像整个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全是他们连做的。这个指导员在我印象中很不好，有一次，讲到他见到林彪时的感想时，用的语言很肉麻，超出了时代的正常区域，即使是造反派歌颂领导人的文艺演出时也没有用过。为了吹嘘林彪身体好，竟然拿周总理做反面陪衬，当时就引起了很多

与会干部战士的反感。这个人后来我提干后一直没见过，估计谁也不敢常用他。

“五好战士”的评比麻烦更是多。因为规定“五好战士”的喜报春节前都要由各单位寄回战士的家中，大家都很有意，如果说一个班只评一两个还好说，可规定的是一个班必须大部分都要评上，还要必须有一两个人评不上，为此班长、排长想尽办法做工作，才能把每年的这项任务应付过去。空军部队虽然飞行人员都是干部，但规定不带“长”的也要参加评，我们部队飞行人员（包括领航员、通信员、射击员）很多都是建国前入伍，每年部队也要把喜报给他们寄回老家，还规定为了保密，喜报不许提“五好飞行员”统一写“五好战士”，弄得老家人都说他们工作肯定没干好，快40岁的人了还是个战士。有的飞行人员儿子、女儿都当兵了，同老子的喜报同时寄回家，弄得大家哭笑不得。所以上级一宣布“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评比取消，可以说上下没有不高兴的。

10月底新69团组建。

11月中旬经上级批准部队开始了正常的飞行训练，前后整整停飞了两个月。12月中旬到第二年7月中央陆续下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部队没有大批停飞，只是分批集中学习。

其它几件事

1、林立果的讲用报告

现在不少文学著作、回忆文章中都经常提到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全空军所有部队都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其实这与事实不符。林立果的所谓“报告”是他就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后，于1970年7月31日在空直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上的发言，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人们肯定要称为“报告”。吴法宪在会上讲了，“空军的一切林立果可以调动，可以指挥”的话。但这些讲话并没有在全空军正式进行传达和学习，空军也没下过文件，吴法宪作为空军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也是一时激动，想巴结一下林家父子。他不傻，因为林立果毕竟不是全空军公开树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只是一个机关的副师职干部，公开学习传达他的报告，从哪条讲都名不正，言不顺。事后他也觉不妥，虽然没有公开收回，但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消除影响。下面所看到的基本上是“手抄本”，各部队只有个别对政治关心的人看到“手抄本”后，因林彪儿子的特殊身份，只是议论一下而已，就像当年看其它“手抄本”一样，（70年代初期由于可看的书籍少，“手抄本”盛行）没看到时想看，看到后也都没太当回事。我也见过林立果讲话的“手抄本”，主要分为三部分：（1）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2）抓革命促生产（3）中国要强盛。学毛著、抓革命促生产是文革时代一个时髦的特色，林立果那时也不可能例外。中国要强盛，除了建议研制垂直起降和短距离起降的飞机以及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外，在关于军队建设、战略上的思考以及现代化方面所讲的基本上是二战时期苏联战将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什捷缅科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以及华西列夫、马诺廖夫等人回忆录讲过的内容，（他们的著作当时因为战备需要，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内部限量发行）。23师从来没有传达过这个报告，也没有在正式场合提过林立果的名字，“九一三”前，师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林立果何许人也。在1973年兰空批林整风学习时，一个所谓上“贼船”的李副政委的检讨中专门讲了，“23师一个师级干部，从外地出差拿回一个手抄本与李贤荣政委商量要给党委会干部们读一下，李脑袋迟钝，表示，不是正式材料，上级也没有通知，不能传达。”

据庄荣海回忆，“九一三”之前69团做过传达这个林立果的所谓“讲用”报告，是当时的团政委姓张，（后来不久他得急性心脏病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召集全团空地勤人员在地勤食堂，

大家是坐的小板凳听他传达的，还有吴法宪的讲话说他是“天才，百年不遇的天才……”等等，因为听的人很多，是向全团传达的。凡是听过的人都可以回忆起来。但是会后没有进行讨论。

从以后的批林整风学习反映出的材料看，除了极个别少数有林立果真正死党的部队外，很少有部队正式进行过学习传达和宣传，起码在兰空范围内没有听到，否则1973年兰州军区范围内部的批林整风学习早给曝光了，大军区不可能放过你。

2、关于在23师追查的问题

1971年10月底，兰空调度室来电话问我们，你们师的运-5直升机去南方训练，现在在光化机场是谁批准的。因为8月底，老69团调防去贵阳时，副团长兼参谋长韩洪才给留下了，他闲着没事干，在运-5中队带新飞行员训练复杂气象飞行。临潼复杂气象天气少，他在我们调度室做了个转场去南方的飞行计划，航线还是我们和他共同选的呢，临潼一城固一达县一重庆白石驿一贵阳一昆明巫家坝。“九一三”时，不知怎么给困在了湖北光化机场。那天是柳位星（去年6月份去世）值班，他接电话后告诉了指挥所。一会儿值班参谋来电说，师领导说了这是我们师定的，调度部门不要管。我们汇报兰空后，兰空值班参谋讲，空军首长问，23师的两架运-5小飞机为什么去那么老远训练。小柳赶紧又汇报。两小时之后董江河师长直接给我们朱洪柱主任（今年5月份去世）打电话说，要向兰空认真汇报，运-5去南方训练，是师党委开会研究定的，因为临潼复杂气象少，训练运输机飞行员条件困难等。我们主任照直汇报，几天后指挥所还来电话问，上面有没有什么新精神。实际后来再也没见什么音信了。

3、老69团调防贵阳问题

九一三事件公开传达不久，师里盛传，老69团组建的50师是林彪在南方另立中央的产物，传了段时间也没见上面有什么正式说法。

文化革命初期，部队正式传达过，“调动一个排都要毛主席批准”，老一点的同志可能都知道。实际上任何时候组建一个师这么大的事，都必须要有中央军委主席的批准才能奏效。从目前中央正式公布的材料和纪实文学著作看，林立果只是有个人的各种计划设想，并纠集他自己小圈子的几个铁杆死党干点偷鸡摸狗、小打小闹的事情而已。林彪根本没有权力调动部队，黄、吴、李、邱连林立果之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都不知道，他们脑袋里可能连想也没敢想过。正如吴法宪在晚年回忆录中说的“不要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是林彪要调动和指挥空军，也要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除了毛泽东本人外，谁都不能够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事实上，林立果只是调动了指挥了空军司令部机关和下边部队的个别人而已，根本就无可能指挥调动空军任何一个军、师、团、营、连、排。珍宝岛事件后，69年底到71年，空军在全国东南西北陆续组建了46至51等师。泱泱大国，进入现代化战争时期，“要准备打仗”（最高指示），组建几个空军部队，看看地图，从整个战略部署来讲，应该是太正常不过了。

4、兰州军区的“批林”学习

1973年，兰州军区部队所属部队开展了联系本单位实际的批林学习。还是分级传达。我记得西北部队“所谓”上林彪“贼船”罪行最大的是总后西安办事处主任白辛夫（正军职，同时在陕西省委兼职），说他是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死党”。其他人有，驻临潼47军政委刘凌（“刘”没错，“凌”字不一定对），主要罪行（错误）是47军在广州军区时“刘”跟司令员黄永胜太紧，打击军长黎原。我前段时间看了《黎原回忆录》，发现黎原到了北京后，除了因为同华国锋的关系问题受点牵连外，与新部门的领导班子之间关系也很紧张。

兰空是李副政委，好像还有一个王副政委和副司令，主要问题是他们在南京空军任职期间支持反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一派组织。文化大革命初期，江苏省很乱，分成三派，“红总”、“八二七”、（俗称“好派”、“屁派”其实都是普通群众组织）以及“促联派”（中间派）。加之大军区机关和驻宁院校也开展“四大”，（野战部队正面教育）军队与地方的派性连成一起。南京军区空军与大军区支持的造反派不一样。我记得1967年夏天，北京街头到处贴着由中央文革顾问康生传达的“最高指示”，许世友是战将，必须要保的大字报。九大、十大许世友进了政治局，划线肯定要以他为中心。这样南空先是政委江腾蛟，后是“刘、于、刘”都“倒了霉”。就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因为在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时说过点过火的话，导致他1979年自卫反击战前被临战换将，遗憾终生，就是晚年进入中顾委后还受到攻击（摘自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虎将王必成》一书）。

其他大干部的后果可想而知，当然江腾蛟后来的问题另当别论。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派性问题延至今日，我目前负责一个内部展览，上周接待了10个80岁以上叫“叔叔”的老人（都为离退休的省厅级干部），他们上午看展览会，中午聚餐。走后我细琢磨，原来“文革”时他们都是一派的中坚力量，现在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或映射攻击另一派人员。看来这一派性问题只有等他们百年后才能消失。

在李副政委的检讨中（我们是听师领导传达的文件），讲了，“九一三”前，23师政委李贤荣在党委会上不让学习林立果手抄本，他非常不满意。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件事。其实兰空李副政委等和林立果及其死党们也没特殊关系，无非是认识“死党”或紧跟形势而已。

11军检讨的一个是军长姚长川，问题是林立果真正的“死党”“小舰队”主要成员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团级）原来是36师的干部（姚为第一任师长），于新野来西安时姚长川接见过他。另一个是副军长张伟良，他在南空担任8师师长时紧跟军区空军支持“错了”造反派。听师领导传达时讲，姚的检讨避重就轻，张的检讨深刻，在会上痛哭流涕（其实张伟良副军长在1969年11军组建时就来到西安，那时林立果的小舰队还没形成）。批判学习结束时，师领导说，军长还是军长，张副军长来飞行时，地勤还要扶梯子，要扶好。

除了白辛夫我不知道外，学习之后这些干部还都是原职原位。张伟良1977年就当上了兰空参谋长。姚长川因为江青说过一句，“姚军长是儿童团”的话受了几年影响，开始降为兰空副参谋长，后来凭能力还是当上了正职。

5、追查拍照片事件

1971年上半年，23师用飞机在空中给“总后西办”的不少仓库拍了照片。1972年4月份一天，戚汉卿参谋长把作战科曹振通副科长、保密室保密员罗守保和我叫到师指挥所，说，“去年我们师的飞机给总后西办拍了不少照片，现在经查，总后西办主任白辛夫是邱会作的死党，白叫我们拍照片是为林彪集团服务的。有关部门叫我们查出是谁给23师下的指示，目前问了些人，都说不知道，师首长研究认为，上级这方面的指示一般都是从作战科、指挥所、调度室来的，现在曹瞎子（曹科长外号）你负责翻阅作战科、指挥所一年多来的所有电话记录（当时师指挥所由作战科负责值班），小王你翻阅调度室一年所有电话记录，值班日记。小罗查找保密室的归档文件里有没有线索。三天交活。”人想表现自己的欲望大多数人都有，我也不例外，听了参谋长的指示，我感到很荣幸，心想，调度室老同志不少，师领导把任务专门交给我一个新调度员，最好能查出点问题来，不辜负首长的信任。回到单位后我立即找出了调度室一年所有的电话记录本、值班日记。连续两天从头到尾一篇不拉地翻看了三遍，结果想找到的信息什么也没得到。4天后，我们三人在指挥所一碰头，结果都是一样。戚参谋长听完汇报后也没再说什么。几个月后，我问曹科长那事什么结果，他说他也没听说。

1998年，曹科长来北京给孙启宗副师长过70大寿时，还主动和我提了这件事。

白辛夫后来也没太怎么样，拍照的事估计是正常工作，也不是什么阴谋，如果真与“政变”有关，早曝光了，早就有专案组进入，一查到底了。

现在想起来，按正常程序，陆军需要空军协助拍照等工作时，他们需要向总参申请，总参把任务下到空军，之后作战部门一级一级下达，最后由11军作战处把任务下达给师作战科（指挥所），一般情况下调度部门先不介入。就是不走大程序，邻居帮忙，也要过11军这道坎，起码军级单位要对军级单位，人情也要军里享受。作战科接到任务，经师首长批准，下达给飞行团。飞行团制定详细计划后再把任务区域报调度室，我们再上报，并进行安全调配。飞行团对这种飞行很重视，科目直接定为“任务”。实施中，军指挥所超短波收听，雷达38团全程认真跟踪，试想，这么重要的一次飞行任务，最后查的结果是不知道任务由谁下达的，想起来都可笑。我估计，“九一三”后各级干部都怕跟林彪集团染上一点边，发现问题，互相推诿、互相包庇，能装糊涂就装糊涂，雷声大雨点小。有的可能还敢撕电话记录本（那时候的电话记录本都没页码）否则，这么大的事查找时各单位一把手怎么都不挂帅呢？事情已经过去40年了，林彪的事件很多都不了了之，何况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随便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受战友文章的启发就罗嗦这么多。文中涉及个人亲身经历的内容准确。道听途说的供消遣、参考。推理、判断的纯属个人观点，一家之言。真实的历史还是由历史学家们考证、评判吧。

~~~~~

## 【文革回顾】

### 我参与查证“给林彪安窃听器”假案

• 张英华 •

1968年11月27日，我在原“罗瑞卿专案组”工作期间，因思想“右倾”而受批判后，被撵回原单位总政学习班。1969年1月6日，领导小组的一位成员找我谈话，他说：“在你来学习班前，吉林省革委会来人介绍吉林搞出一起1963年夏林彪在长春休养期间，林的驻地被安装窃听器的大案件。10天前，吉林省的‘申某（分管警卫工作的公安厅原副厅长）专案组’又来谈了该案的情况，说总政保卫部副处长李某（原军委办公厅军委警卫处科长，是林彪在长春休养时的随身警卫，后调总政保卫部任副处长）是此案的重要成员，要求总政学习班配合并对其进行审查。现在领导上已决定成立‘李某专案组’，由你负责，另外还有两位同志参加，和你一起工作。”我说：“我因思想‘右倾’刚从‘罗案组’受了批判回来，不适合再搞专案了，还是再选一位更合适的同志去搞吧！”他说：“总政军管小组已经批准，不要再改了。”我只能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从1969年1月至1970年7月，历经一年半的调查研究和反复查证，终于弄清了这纯粹是一起子虚乌有的大假案。

总政保卫部的李副处长是位老警卫干部，长期从事警卫工作。他1923年出生，1938年入伍，1939年入党，曾当过贺龙元帅的警卫员，跟随张经武同志进军西藏。1965年从军委办公厅调到总政保卫部任副处长，现在总政学习班学习。我们根据学习班的工作安排，结合当时的“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在小组会上让他谈谈1963年跟随林彪在长春休养的情况。他说去的时间不长，回北京后再没有回长春，对窃听器问题只字未提。

1969年国庆节前，我们三次赴长春，在“申案组”看了大量的揭发交代材料，找了几十名涉及此案的处长、科长，一般干部和服务人员调查。开始觉得问题很大，也很严重。随着调查研究的步步深入，发现的矛盾越来越多，疑点也越来越大。最明显的是：有人说安装窃听器是李某指挥的；有人说为了不让李某知道此事，专门派人对他进行监视。有人说李某在长春住了两个多月，回北京几次，每次都把窃听到的录音带和整理好的材料让带回北京，交给公安部八局（警卫）某副局长了；有人说他回到北京后再未回长春。对这些矛盾和疑点，我们一个一个地进行了核对和查证，查阅了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和公安部八局的值班日记，查阅了总参管理局保存的差旅费，伙食补助费的报销单据；查阅了门诊部、医院看病和住院的病历，等等。证明李某1963年5月18日至7月7日，在长春共住44天，回京后再未回长春，否定了说他在长春住了两个多月且往返几次的不实之词。在查阅公安部八局和十二局的档案中也没有发现从长春送来的录音带的整理的窃听材料。有人说李某带回的录音带和材料交给了某副局长，经查，1963年春某副局长因肝病住进了当时的“反修医院”（现在的友谊医院），出院后在家全休。否定了说李带材料交某副局长的虚假交代。

1970年4月21日，我们第四次赴长春，将我们对李某问题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向“申案组”作了介绍，他们同意我们的看法。

这时，他们已经定案，有的判刑，有的下放农村安家落户。为了进一步弄清此案的几个重大矛盾和疑点，我们提出审讯几个所谓主犯的要求。经同意后，我们问了以下几个问题。

问：你们安装的窃听器共有几个发射器。

答：每个房间都有，会议室，会客室，林彪、叶群秘书的卧室都有。

问：你们有几个接收器。

答：一个。

问：如果每个房间都有人讲话，你们怎么接收？（低头不语）。

问：用的电源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

答：是的，直流。

问：用几节电池。

答：八节。

问：能用多长时间？

答：一个月。

问：林彪住了多长时间？

答：两个多月。

问：中间你们怎样更换电池？

他低头想了很久才答：想法调动首长，让他出去转转。回答后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

问：你们的窃听器还带摄像头吗？

答：没有。

问：为什么在交代材料中说林彪在看《解放军画报》时，当看到郭兴福教学法那一页就停住了，并且注视了很久。如果窃听器没有摄像功能怎么能知道林彪看的是《解放军画报》呢？又怎么能知道他看到郭兴福那一页就停住了呢？

他又低头不语，沉思良久，不停叹气。我看他内心斗争十分激烈，随即向他读了两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他听后更加不安起来，连着叹了几口气说“唉！一就就一就了！”然后又低下了头。我理解

他的意思是：“已经这样，就这样吧。”

回北京后，经过多次讨论研究，认为这是一起大假案，不管吉林怎么定案，我们的结论是李某没有参与过给林彪安装窃听器的活动。结论材料经上报批准后，与李某本人见了面，他非常感谢组织上给他查清了问题，并按正常手续分配了工作。这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那特殊的政治气氛中，能作出这样的结论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吉林省委对此案进行了认真复查，并作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申某不知怎么知道我已调到军政大学工作，把吉林省委对他的平反决定和《吉林日报》关于平反大会的报道都给我寄来了。他分配到四平市任市委书记。后调中央党校学习，还专门来看我，可惜那天我不在家，未能见面，甚觉遗憾。1982年他调任公安部八局局长，直至离休。但愿他健康长寿，安度晚年。

（作者为国防大学副军职离休干部，公安部离休干部汪春耀整理）

□ 《世纪》2011年第5期  
~~~~~

【文革探索】

林彪的第三张“九八手令”

• 舒 云 •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专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林彪等人党籍。

1980年11月2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宣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查终结，移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980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因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官方唯一的证据是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现在发现三张“林彪手令”。

林彪秘书于运深告诉我，9月8日晚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先去了毛家湾，在走廊上，林立果从白衬衣的上衣口袋掏出一张16开白纸，竖版，给于运深看。看来这张就是在怀柔直升机场现场被周宇驰撕碎的那张。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上交，1972年7月2日，由中共中央中发〔1972〕24号文件公布，但缺失近三分之一的字迹，文字竖写，16开。

第二张是1971年9月8日林立果给胡萍、关光烈看过，文字横写，16开或者32开。

第三张出现于1972年9月15日，当时汪东兴派中办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等三人到北

戴河清理 9 6 楼的文件。《党史博览》2 0 1 1 年第 1 2 期刊登武健华的文章《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住地的清查工作》，其中写道：我们进入 9 6 楼，仔细查看了卧室、起居室、会客室、值班室等处。有些地方显得相当凌乱，门窗橱柜有的半开半关，书、报、杂志、信件等到处堆放，有些纸张、办公用品散落在地毯上、墙角边。面对这样杂乱的情况，我们开始确定与文件有关的物品。以秘书办公室为中心，逐屋先搜罗集中起来。我们从林彪、叶群的卧室、起居室、书房到会客室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用房，一间一间地清理，桌子、橱柜、枕边、床下，片纸只字都不放过。”

此举完全破坏了现场。

武健华说：“集中以后，我们又仔细进行梳理，分清急缓予以处置。就在我们进入 9 6 楼的第二天，我们清理出一张 3 2 开大的白纸，上面用红铅笔写的‘盼照、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八。’当时我们只知道这份材料非常重要，马上派人急送中央办公厅。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央公布的林彪写的“九八”手令。

我专门问了武健华，是不是 3 2 开大的纸？他肯定说：“是的，一本书大，比杂志小一半。字是横的，两行。是在北戴河 9 6 楼书房外间的桌上放着的。”

中央 2 4 号文件公布的“林彪手令”是在怀柔直升机现场发现的，已经被周宇驰撕碎。拼起来是 1 6 开纸，纸是横的，左半边空着，右半边竖写。

“林彪手令”的内容证明不了林彪妄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更何况出现了三张“林彪手令”，林彪案审了十年，成千上万的案审人员为什么不对林彪的唯一证据下功夫侦查，搞清事实真相呢？

□ 选自《舒云博客》

~~~~~

【书刊通讯】

林彪文集面世颠覆官方史观

• 江 迅 •

林彪一百零四岁诞辰，香港出版首部《林彪文集》。研究者认为，文革由毛泽东发动，应首先追究毛的责任，林彪和江青被毛利用，而非林、江利用毛；而林更渐成为毛继续推行文革的重要阻力。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刚过去的一年，是中共第一代主要领导人、曾被视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死去四十周年。十二月五日，在他一百零四岁生日之际，香港出版了一部《林彪文集》，这是第一部在香港出版的林彪文集，由中港传媒出版社有限公司推出。前不久，林彪事件研究学者先后在北京举办了两次民间研讨会。

《林彪文集》是从国内外散见的公开发表的林彪文章、报告、信件、电报汇编而成。收集到的文字超过一百二十万字，这部书精选了八十九篇、五十八万字，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七零年间的有代表性的军事论述、政治报告，以及党内广为流传的信件。书中文字，四成来自中国内地的公开出版物，六成来自海外资料室或图书馆，余下文章会继续推出，希望今后能搜集更多史料，继续系列出版。据悉，此书出版，征求了林彪家人如林立衡（林豆豆）的意见。从搜

集到编辑花了一年时间。书中大部分文章有发表日期，仅少部分无法确认何时发表。出版社在搜集林彪文章时发现，有的同一篇文章出现多个版本，文中一些用词不同。出版社编辑坦承，此书出版有一大遗憾，由于出版社缺少林彪问题研究学者，因此全书没有作任何注释。

主持这部文集出版的中港传媒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燕军，于十二月五日深夜发了一条微博：“四十年过去了，林彪仍身首两地，回不得故国。我们中国人政治里浸染的冷漠实在沉厚。今天是林彪一百零四岁诞辰，在今天结束的最后一刻，向这位解放军最知名的元帅敬礼。相信随着历史尘封的开启，人们对林彪的解读会逐步趋向客观。非黑即白的评说毛林之争，恐怕难以厘清历史真相，要宽容地看待历史。”

震惊中外的所谓“九一三事件”，按中共官方早先的论断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的事件，又称“林彪叛逃事件”。林彪是中国当代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代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他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中共二号人物，党内唯一的中央副主席，曾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破天荒地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但其后与毛泽东关系破裂，随即失势。中国官方描述其在试图发动政变失败后出逃，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据悉，二零一一年“九一三事件”四十周年前夕，北京举办了两场研讨会。一次是八月，规模较小，十多名林彪问题研究学者参与，有阎长贵、林蕴晖、余汝信、王海光、吴迪、司马清扬、丁凯文、卜伟华、蒋健等。他们对新出版的所谓“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即林彪派系主将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的回忆录、传记中的叙述作了评述，对当年军委办事组、对林彪出逃那晚的细节等问题作了研讨。

九月四日，在北京举行的“九一三事件”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规模大多了。“九一三事件”当事人亲属和学界文革研究者、外交人员、教授、记者共五十多人相聚，座谈四十年前发生的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对林彪事件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角角落落作了阐述和探讨。出席者有原空军副参谋长兼三十四师党委书记胡萍夫人刘继馨、儿子胡耀萍、胡幼萍、吴法宪女儿吴巴瑾、江腾蛟女儿江新文、江新德、原空军作战部部长鲁氓的子女鲁岩、鲁莹等；有“九一三”北戴河当夜的亲历者、林豆豆丈夫张清林、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儿子贺铁军、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儿子阎明、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儿子王鲁宁、最先到温都尔汗现场勘查的原驻蒙古使馆翻译沈庆沂和二秘孙一先之子及学者李延明、姚监复、丁凯文、徐海亮、王海光、徐友渔、陈子明、丁东等。

寒来暑往，春去秋来。中共于一九七一年发布了五十七号文件等相关材料，对“九一三事件”作了解释，但至今基本档案仍未开放，多年来海内外诸多学者对此事件抱有强烈的研究兴趣，一些反思性文章陆续问世，当年和林彪事件有关涉的人员及其家属也以不同形式披露了若干口述材料。

这些文章和资料的共同点是：修正了官方对“九一三事件”的解释框架，对该事件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其中有些文章对林彪抱有强烈的同情。当年下发的官方材料，“四人帮”曾参与其事，其基本结论在一九七九年后依旧维持下来，由此可见，若干论断确实疑点重重。

六十岁的余汝信是香港文革研究资深学者，在北京的林彪问题研究学者圈子中举足轻重而颇享声誉。文革时期，他还是内地中学生，移居香港二十多年。文革期间、文革以后，他一直注意收集文革材料。在香港经商之余，他始终没有放弃文革研究。他接受采访时说：“有些人研究文革，重点是研究红卫兵运动，比如徐友渔、印红标、宋永毅。我也研究过红卫兵运动，编

过一本《红卫兵兴衰录》，是在香港出版的。后来，我主要研究文革中军队与文革的关系。红卫兵运动的材料还算比较容易收集，研究的人也多。但是研究文革中军队与文革的关系的学者很少，我于是另辟蹊径。研究文革的学者，对军队熟悉的不多。当年文革‘三支两军’，一九六七年开始，直到七二年结束，也就是‘九一三’后一年，军队才慢慢退出。这五年，军队掌握着中国的主要权力，如果不透彻研究这五年，研究文革就是不完整的。”据悉，余汝信撰写的《香港，一九六七》一书已杀青。全书叙述的是当年一百多天香港的故事，那是中国内地文革输出，向香港延伸的历史，全书近二十万字。另外，他还整理编注了《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前几年已经在香港出版。

余汝信接受采访时说：“将林彪视为反革命集团，定性不准确，要还他历史本来面目，要为他正名，恢复历史本来面貌，不能把罪名推在他一个人身上。林彪研究，由于官方档案还没开放，主要是靠当事人或他们家人的回忆录。林彪手下的四大将回忆录、传记都出版了，有不少亮点。举例说，林彪出走后，黄永胜与邱会作见面，黄说，他妈的，跑什么跑，害死人了。如果要他们在林彪与毛泽东之间作选择，他们还是会选择跟毛的，尽管毛的疑心很重。说他们另立中央，是不可能的事，林彪也不会。当然林立果是不是有这个想法，难说没有，但难以成事，这些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 ◇ 文革中最大逍遥派

余说，文革前，林彪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是有责任的，林不是完人，这需要客观评价。林与毛的分歧是在中共九大以后，在庐山会议上，毛与林出现裂痕，现有的材料都清楚表明了这一点。毛的理论是继续革命，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不过，林彪是文革最大的逍遥派，他始终认为革命过头了，有些厌倦了。毛怎么说，他就怎么画圈。后来毛对林的猜疑越来越重，认为林的周围形成一个圈子，林逐渐成为毛继续革命思想理论的重要阻力。把文革错误推在一两个人身上，推在“林彪集团”、“江青集团”身上，是不公正的。文革的错误是全党性的，是党的主席提倡的、领导的，要追究责任，应首先追究毛的责任，林彪和江青都被毛利用的，而不是林、江利用毛。

他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林彪功劳不可抹杀。当然，今天暂时还看不出林彪经济建设的理念，但他在军事上是帅才，从元帅排名看，他排第三，实际军事才能完全可排首位，在元帅中他是最拔尖的。中共从军事活动转到经济建设，毛泽东选择林彪为接班人，是权宜之计，不是最好选择，党内接班人当时还有邓小平。但把文革一切错都推在林彪身上，不是客观的评判。不需要什么机密材料，从今天人们掌握的材料看，整体的看法已经明确，但在历史细节上，有些还是把握不住，比如“九一三”那天晚上，林彪到底愿不愿走，到底是想往北走还是往南走等等，到今天还是没能找到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可能永远找不到了。几个当事人都死了，后人只能靠推论。

#### ◇ 林彪过早对决江青

余汝信认为，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犯了策略性错误，过早动了上海帮，毛在世时是绝对不能动上海帮的，林彪下手过早了。林彪没完成的事，在毛死后，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他们完成了。他说：“我研究林彪问题的目的是寻找历史真相，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至于现实意义，不是历史研究者探究的重点。现在，有些人碰到现实问题，比如腐败问题，就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其实，回到毛泽东时代，一不可能；二完全是错误的。从历史学角度看，文革的路是不可能再走的了。”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